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运用

——以南传佛教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调查分析为例

○ 董　宸

摘　要：民族音乐学是连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桥梁，问卷调查是通过实证进行定量研究的典型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在民族音乐学调研中，对问卷调查进行适当妥善的运用，有助于针对具体问题从微观视角系统地加深对音乐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认识。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人文对象的主观性特征，在运用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时有一定难度，极少涉及问卷调查方法。而在针对南传佛教佛学院现代佛寺教育模式下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发展情况的调研中，鉴于调查问题、研究范围和对象具有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尝试以佛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并通过分析总结得出较为有效的调查结果。进而对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调查中的使用提出初步的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拓展该方法在本学科的应用。

关键词：问卷调查方法；交叉学科；南传佛教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

中图分类号：J607；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0）04-0093-11

收稿日期：2019-11-05　　**DOI：**10. 13812/ j. cnki. cn11-1379/ j. 2020. 04. 010

作者简介：董　宸（1989－ ），女，汉族，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特聘研究员。

一、引　论

民族音乐学是连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作为最初的学科平台开始，就有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音乐文化和作为方法论支撑的人类学两个基本来源”①，研究的议题始终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问卷调查是通过实证进行定量研究的典型方法，从人文角度考虑，问卷调查是“通过对个体进行一套标准化的问题调查，以获取人类活动的感知、行为、态度等原始数据的一种研究方法”②。由此可见，在民族音乐学调研中对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适当妥善的运用，有助于针对具体问题从微观视角系统地加深对音乐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认识。

目前，问卷调查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民族音乐学学科从文化行为角度理解音乐，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但是民族音乐学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音乐及其相关文化，具有典型人文对象的主观性特征，使得民族音乐学较难开展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因此，虽然民族音乐学处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关联之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音乐，探索关于艺术行为和艺术产品的知识与规律”③，但无论是从学科理论方法角度还是研究实践角度，都极少涉及对问卷调查方法的讨论。目前，从

①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第12-13页。

②Nicholas Clifford, Gill Valentine. *Key methods in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231.

③〔美〕艾伦·帕·梅里亚姆著：《音乐人类学》，穆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25-26页。

研究实践角度涉及问卷调查方法的有：齐琨在针对香港庙街高升歌座的考察中，用调查问卷作为了解访问对象基本信息的手段；[④]李松兰、黄虎在对全国高校音乐院系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传承现状进行的调查中，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随机抽样，并对最终回收的33份问卷进行了分析。[⑤]在研究方法角度，仅有杨曦帆在《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中，以介绍的方式提及在社会学基本调查方法中的抽样、问卷、统计方法。[⑥]

问卷调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本质是通过统计获取“数据”的一种途径，在运用中可通过对多种方法的把握，根据实际调查需要，借助统一、标准的收集程序，获取有针对性的调查结果。考虑到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交叉学科间理论方法交流互补的发展趋势，不仅民族音乐学日益受到相关交叉学科的重视，而且学科自身也逐渐呈现出综观、包容、多元的积极发展态势。因此，民族音乐学对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人文学科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中相对更具客观性的分析验证方法的一个典型方式，通过带入本学科聚焦式和融入参与式[⑦]的田野调查中进行适应性的吸收，并结合研究实际对该方法进行转译和掌握。这样，可以在音乐文化材料系统收集整理的过程中，辅助具体调查内容展开综合分析，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社会内容是如何渗透到音乐当中的，进而分析阐释音乐行为与社会习俗的关联及其构成的规律。

结合民族音乐学及其交叉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目前对问卷调查方法的应用实际来看，问卷调查涉及的调查范围多集中于城镇，尤其是在校园中的运用最为普遍，不仅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并且调查过程的可控性较强。鉴于以上，笔者以较为充分的前期调查为基础，考虑到调查问题、研究范围和参与对象具有展开问卷调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尝试使用该方法。笔者针对自1980年宗教政策恢复后，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发展重构中产生的佛学院教育模式，以其经文—诵经的教学及构成情况为研究对象，以佛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半结构式[⑧]的调查问卷，对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和风格的组织构成、产生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得出较为有效的调查结果。进而尝试在此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使用提出初步的建议，以期启发和拓展该方法在本学科的应用。

二、南传佛教佛学院教育模式中有关学僧经文—诵经学习情况的调查问卷

中国和东南亚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其传统文化中适龄男童都要出家为僧，在佛寺接受教育，世俗教育依附于佛寺教育，形成“教教结合”模式。自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普及推广以来，“和尚生”就成为世俗教育与佛寺教育相互适应而产生的特殊学生群体。目前，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多集中于学校教育与佛寺教育传承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就现代发展产生的问题，针对信仰南传佛教的民族社会自身主动进行适应和解决的关注还不够。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传佛教佛学院的开办和发展就是佛寺传统教育模式现代化适应和改良的一个非常

④参见齐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的问卷、访谈、观察——以香港庙街高升歌座考察与分析为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⑤参见李松兰、黄虎：《2014高校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现状调查报告——关于33份调查问卷的分析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⑥参见杨曦帆：《社会学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艺术探索》，2006年，第S1期。

⑦参见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

⑧半结构式的调查问卷，介于结构式和开放式之间，根据不同的问题类型，既有结构式的固定标准答案选项，也有开放式的让被访者自由发挥。

典型的例证。一方面，佛学院通过应对外在变化，调整自身进行改良，即整合佛寺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世俗教育），确立自身的经文—诵经教学系统；另一方面，佛学院集中了西双版纳各地的学僧和老师，这里的人员构成及其对经文—诵经内容和风格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西双版纳各地南传佛教信仰传统恢复发展的情况。进而，学僧在佛学院对经文—诵经内容和风格的学习掌握，又会在日后对西双版纳各地形成反馈，产生影响，逐渐作用于地方传统的发展重构中。

（一）佛学院办学模式确立过程的概况

南传佛教传统的佛寺教育主要涉及文字、经文、诵经、佛法、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恢复宗教活动后，为应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体社会的发展变革，西双版纳南传佛教社会依据佛寺教育传承发展宗教、民族文化的需要，逐渐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西双版纳地区有政策规定，为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要求男童在小学毕业后才能正式出家为僧。由此，小学毕业前男孩只能作为“科勇”[⑨]在佛寺旁听学习，接受家中父母的管教，不能在佛寺过夜。小学毕业后的男孩举行“升小和尚”仪式，出家为僧，白天去学校接受中学教育，放学后回到佛寺继续学习傣文、经文和佛法。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男孩子进入寺院后成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员，只接受佛爷的管教，父母亲人甚至学校的老师都成为了他的信徒。在传统佛寺教育中，小和尚一直在寺院中，时时接受佛爷的耳提面命和老人、信众的监督，然而在现代学校教育和佛寺教育的交锋中，对小和尚的管理形成了寺院、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管理真空，小和尚越来越难以管教。第二，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小和尚要面临出家还是还俗的选择，以及继续接受何种教育的选择。这些小和尚，如果初中毕业后还俗，通常达不到上高中的条件，大部分会在尚未成年前就务农或进入社会工作，而继续出家的小和尚，就要继续兼顾在学校和佛寺的学习，课业压力很大。这种现实矛盾和非此即彼的选择冲突，分流了不少原本想要进入佛寺或者留在佛寺学习的孩子，直接影响到以经文—诵经为主体的宗教文化传承。

由此，为了给不同阶段的适龄男孩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受教育的选择，并在保证僧侣数量的同时提高僧才质量，20世纪90年代经中国宗教局批准，在西双版纳景洪建设了云南省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所南传佛教专门院校。佛学院旨在为小和尚提供更高级的专门佛寺教育，并表现出对传统佛寺教育方式的改良。首先，改变了村寨佛寺的分散教学和管理，将不同地方适龄的小和尚集中在一起统一接受教育，将传统宗教社会结构与民族社会需求结合，继续维持佛寺教育方式的传承。其次，从政策层面继续协调，与现代世俗学校联合办学，学校教育和佛寺教育双轨协同发展。再次，淡化了寺院、学校和家庭之间对小和尚的管理真空，并为学僧提供更多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为培养高水平僧才和社会人才提供了条件。

根据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佛学院目前教育模式的确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5年，萌芽期。松列龙庄勐自1992年担任总佛寺住持起，开始组织进行佛寺教育，1993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招生，主要组织学僧进行集中的短期培训。

第二阶段：1995–2004年，调试期。“云南上座部佛学院”在1995年挂牌成立，开始正式招生，主要是培养初级僧才，聘请中专退休教师来佛学院教小和尚文化课，由此开始了佛寺传统教育方式和现代学校教育方式结合的尝试。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确立发展期。2005年，佛学院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与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在佛学院开设

⑨“科勇”，为傣语音译，即“预备小和尚”。

“傣汉双语”中专班，正式确立佛寺教育和现代教育结合的办学模式。学僧在佛学院接受规范的学校课程教育和佛寺传统教育，毕业后授予中专文凭，并可继续到东南亚佛教大学留学或中国各地高级佛学院进修。2010年，又与西双版纳州第二中学联合办学，在佛学院开设初中班。截止到笔者进行问卷调查的2016年2月，佛学院授课教师共12名（见表1），学僧共四个班级，其中中专三个年级各一个班，初中有一个班，且由于学僧傣文程度和经文诵经水平的差异，又分成两个佛学教育小班进行授课。

由此，在佛学院这种集中教学管理模式的发展下，其统一、规范的经文—诵经教学系统和诵经风格，不断巩固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表1　佛学院教职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姓名、僧阶（民族）	职位	籍贯	学习经历/地点	授课内容
DJZ⑩都⑪（傣族）	教务主任、教师	勐海县勐遮镇	西双版纳泰国	佛学课
MHJM 玛哈⑫（傣族）	教导主任、教师	勐腊县	西双版纳泰国	佛学课（戒律）基础傣文
MHL 玛哈（傣族）	教师	勐腊县	西双版纳泰国	佛学课（佛法论述及分类）基础傣文
MHHK 玛哈（傣族）	教师	勐海县打洛镇	西双版纳泰国	佛学课（佛教历史）傣文语法
DWXZ 都（傣族）	班主任、教师	勐海县勐遮镇	西双版纳泰国	佛学课（佛陀传）基础傣文 傣语故事经诵经课
DWXH 都（傣族）	班主任、教师	勐海县	西双版纳泰国	傣文语法 泰语
DHDK 都（傣族）	班主任、教师	景洪市勐罕镇	西双版纳泰国	巴利语/傣语故事经诵经课
DHDX 都（傣族）	班主任、教师	景洪市勐罕镇	西双版纳泰国	巴利语/傣语故事经诵经课
DGH 都（傣族）	教师	景洪市勐罕镇	西双版纳泰国	基础傣文
DE 都（傣族）	教师	勐海镇勐遮镇	西双版纳	巴利语诵经课
DHN 都（傣族）	教师	勐海县勐遮镇	西双版纳泰国	巴利语诵经课
DD 都（汉族）	教师	青海省北州祁连县	云南大理西双版纳缅甸	佛学课

（二）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及经文—诵经教学的基本情况

根据笔者的调查情况，佛学院的教学安排为：

1. 常规教学课程

（1）中专班，上午（四学时）安排学校教育课程，下午和晚上安排传统佛寺教育的课程；

（2）初中班，上午（五学时）和下午（三学时）安排学校教育课程，晚上安排传统佛寺教育课程。

2. 常规教学实践

（1）早上6:30、晚上7:30，全体学僧在大殿例行早、晚课诵经仪式（各约一小时）。

（2）每年“赕维仙达腊”（供养“维仙达腊”佛本生傣语故事经）仪式，每位学僧分配一本经书，独立完成诵经。

在佛学院的传统佛寺教育课程中，常规课程包括傣文课程、巴利诵经课程、宗教理论课程等，并编印了相应的教材。其中傣文课程使用老傣泐文课本学习，熟练掌握文字是学僧能够进行傣语经文诵经的基础。巴利诵经课程使用巴利语诵经教材，教材是从篇幅极大的手抄巴利语三藏经典中抽取早晚诵经和仪式常规使用的内容，编辑刊印而成。佛学理论课采用的课本分为初、中、高级，包括经、律、论三藏经典和佛陀传，是20世纪90年代起从东南亚留学回国的僧侣用泰国、缅甸的佛学课本翻译而来，帮助学僧理解巴利三藏经典中的蕴含教义教理。非常规的课程为傣语诵经课，短期集中培训。培训使用《维仙达腊》佛本生故事经，佛学院教师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其进行了重新编译、校对，并最终成套刊印。根据佛学院的教学安排，中专班周一、三、五上佛学课，二、四上巴利诵经课并检查背诵，初中班周一、三、五上傣文课，二、四上巴利诵经课并检查背诵。

其中，经文诵经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反馈性，除了对经文内容的读、写、背有熟练程度的要求，还要掌握诵经音调。诵经课程包括教、学、检查三方面，不同班

⑩在咨询相关负责人意见后，姓名标识仅首字母。

⑪南传佛教的僧衔称谓，即比丘。

⑫玛哈，是巴利语，直译为“大”，南传佛教里指受过佛教高等教育，有大学问的人。

级由不同老师教授统一的经调，并检查经文背诵和经调掌握情况。同时学生每日的例行早、晚课和各类仪式活动的诵经，也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巴利诵经的内容和音调。傣语诵经教学在20世纪90年代被特别强调，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傣语拼读和诵经经调。后由于课程和教学安排的时间限制，傣语诵经课程逐渐弱化，集中在每年举行“赕维仙达腊”仪式前的节假日进行学习。傣语诵经的基础是傣文的拼读能力，老师主要传授经调，包含诵经时高低起伏的旋律以及断句、气口等方面。

（三）问卷调查的设置

基于较充分的前期调查，笔者用半结构式调查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佛学院的学僧群体就诵经音声的了解程度、学习掌握情况、自我评价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也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政策恢复后南传佛教信仰传统在西双版纳各地自主恢复的情况和程度，以及总佛寺—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及风格发展的实际情况。

佛学院学生数量为88人，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完成度和回收率，与教务长和各班班主任事先达成协调和统一，留出课堂时间给学僧发放并完成问卷88份，全部回收，回收率为100%。截止到调查结束的2016年2月份，西双版纳佛学院中的两个班有少量来自德宏和思茅的学僧，不属于常规性招生，根据问卷调查的目的，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籍的学僧问卷不属于有效问卷，因此回收后问卷的有效率为80%。调查问卷问题选项主要采取基本统计法进行分析，无打分选项，未涉及信度、效度的测算。

问卷共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学生的个人基本材料和偏基础认知的问题。包括班级、年龄、生源地、出家时间、来佛学院前的学习经历等。

第二部分：选择题。主要关注学僧在未来的规划中对所学内容的使用／适用情况的判断，以及他们对各自的地方传统经文—诵经系统与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的比较和判断等。这些问题比较全面地涵盖了佛学院学僧基于自身的学习情况，对地方传统及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现状整体的普遍性评价。

第三部分：半开放问题。希望学僧发表自己对佛学院经文—诵经及其他课程设置和学习方面的看法、需求和意见，毕业后的个人规划，以及对所学内容的运用。问题提取有关诵经内容和风格传承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让学僧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进行评价。

三、学僧经文—诵经的学习基础

（一）佛学院学僧的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对佛学院不同班级学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2），其中不同班级学僧的年龄分布情况为，中专班7班（即中专三年级）17–21岁，中专8班（即中专二年级）16–20岁，中专9班（即中专一年级）15–19岁，初中班14–19岁。

表2　佛学院学僧基本情况统计表

生源 / 班级	西双版纳			普洱	德宏	总人数
	景洪市	勐海县	勐腊县			
中专 7 班（三年级）	5 人（傣族）	7 人（傣族 6 人、布朗族 1 人）	无	8 人（傣族）	6 人（傣族）	26 人
中专 8 班（二年级）	3 人（傣族）	12 人（傣族）	1 人（傣族）	4 人（傣族）	无	20 人
中专 9 班（一年级）	1 人（傣族）	10 人（傣族 9 人、布朗族 1 人）	无	无	无	11 人
初中班	5 人（傣族）	26 人（傣族）	无	无	无	31 人
学生共计	14 人	55 人	1 人	12 人	6 人	88 人

根据对学僧基本情况的统计结果，得出以下判断：

其一，中专7班和8班有部分来自普洱（以景谷为主）和德宏的学生，由于目前德宏佛学院尚未建设完成，普洱仅有景谷、普文等傣族聚居区信仰南传佛教，没有集中办学的条件。该情况具有偶然性，不属于固定招生范畴，故此，非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籍的学僧问卷不属于有效问卷的范畴。

其二，佛学院的布朗族学僧所占比例很小，据此结合笔者同布朗族祜巴和往届佛学院的布朗族毕业生的访谈情况来看，一方面，布朗族主要聚居于勐海县布朗山等地，在宗教恢复时，依托仅一山之隔的缅甸布朗族聚居区，在僧侣、宗教活动、经书文本、诵经风格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另一方面，相对于聚居于平坝地区的傣族，布朗族受到现代化的冲击较晚、较小，目前布朗族聚居区的僧侣和小和尚相对数量较多，且没有完全遵循男孩必须小学毕业后才能出家的规定，很多男孩自小就出家在佛寺接受传统教育。由此在布朗族聚居区，南传佛教文化传统和佛寺教育传承维持情况较好，现代教育和传统佛寺教育之间的矛盾不突出，因此布朗族学僧去佛学院学习的需求少。

其三，西双版纳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市（县）的学僧数量的比例差别较大，佛学院分别来自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的教师数量的比例为3∶6∶2，学僧数量比例为14∶15∶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恢复后三个市（县）信仰文化传统在民间的恢复情况决定的，恢复情况越好，则僧源越充足，反之则不然。

（二）学僧入学前的学习基础情况

中专班的学僧，在来佛学院学习前已经在村寨佛寺学习过的占98.2%，其中学习过傣文、巴利经文诵经和傣语故事经诵经的分别占89.4%、84.2%、36.8%。学僧入学前都是在村寨佛寺跟随住持学习，住持为本寨人的占78.9%，有外出学习进修经历的占46.7%。入学前有一定傣文和诵经基础的初中诵经1班，人数占整个初中班人数比例的45.1%，其中来自勐海县勐混镇的学生占到了78.6%，这部分学生入学前跟随村寨佛寺的住持学习，住持均为外地僧侣，其中92%在缅甸学习过。初中诵经2班是没有傣文和诵经学习基础的学僧，在入学前接受过佛寺教育的比例达93.3%，但只学习背诵了升小和尚仪式中需要使用的诵经内容。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傣文和巴利诵经在西双版纳各地都属于小和尚入门学习的重点，巴利诵经在男童正式出家前就会接触到，参加升小和尚仪式都要背诵相应的经文。但这时的诵经教学是口头模仿和背诵，系统的文字学习通常在入寺后才正式开始，傣语故事经诵经的学习则是在掌握所有文字之后才能进行的，傣文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诵经技巧的发挥，故此，在入学前学习过傣语故事经诵经的比例相对较低。

西双版纳地区规定适龄男童须在小学毕业后才能正式入寺成为小和尚，佛学院的初中班，就是为小学毕业后刚成为小和尚的学僧们开设的。受到现代教育的挤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较快的市镇，很少有男孩在正式出家前进入佛寺学习，因此在初中班一半以上的学僧在出家前少有傣文和诵经基础属正常现象。但同时，也有较多信仰环境和寺院管理较好的区域，准备出家的男孩很早就会作为预备小和尚经常出入寺院与小和尚一起学习，参加早晚课诵仪式，有了较好的文字和诵经基础。由此，佛学院初中班的学僧们在入学时，其学习程度形成了两极分化，佛学院根据这种差异，将初中同年级的学僧，在传统佛寺教育课程中，分为一个提高学习班和一个基础学习班，其中初中诵经1班为有一定佛寺学习基础的学僧，初中诵经2班为没有佛寺学习基础的学僧。

在初中诵经1班中，来自勐海县勐混镇的学生占78.6%，分布在不同的村寨佛寺，并且这些村寨佛寺中的住持很多都有在缅甸学习进修的经历。这与勐混镇自宗教政策恢复至今，南传佛教文化传统的恢复情况和整体的信仰环境都维持得比较好有很大关系。勐海地区凭借与缅甸便利的跨界区位优势，依托密切的民间宗教文化往来，维持了相对较好的信仰传统。

（三）学僧对地方与佛学院诵经风格的比较、判断

问卷根据学僧在佛学院入学前、后分别在不同地方学习的这一情况，提出有关村寨佛寺和总佛寺—佛学院不同类型经文诵经风格的异同问题，并进一步调查诵经风格的差异对学僧学习的影响情况。

有关巴利语经文的诵经风格，问卷显示，中专班学僧在生源地与佛学院风格的差异程度在“很大”“一般／较小”“没有”三项之间的比例（以下简称为“‘三项’的比例”）为6∶22∶9，而初中班为0∶24∶7。随后的问题是关于差异的程度对学僧学习影响的程度，其“三项”的比例中专班为0∶14∶23，初中班为0∶14∶17。针对傣语故事经诵经，学僧对其生源地与佛学院诵经风格差异问题的判断，其“三项”的比例中专班为7∶24∶6，初中班为2∶27∶2。而在这种差异基本没有影响学生学习新的诵经风格的问题上，“三项”的比例中专班为0∶17∶20，初中班为0∶11∶20。且学僧们都认为自己能够跟上现在佛学院的傣文、巴利诵经和傣语诵经课程。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

首先，从巴利语经书诵经风格来看，传统的地方风格与总佛寺—佛学院确立的诵经风格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其中一部分学僧认为村寨佛寺和佛学院的巴利语经文诵经风格没有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在的村寨佛寺的住持都有在佛学院学习（毕业）的经历。

其次，从傣语经书的诵经风格来看，佛学院和村寨佛寺傣语经文诵经风格的差异程度，学僧选择差异大和较大的比例较高。一方面是由于傣语故事经文比巴利语经文诵经有更强的“旋律性”，不仅地方性风格明显，且有个人发展创作的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虽然佛学院的老师接受的是各自地方（村寨）的传统诵经风格的传承，但经过长期个人念诵实践和在外的学习生活，诵经风格都发生了一些融合和变化。因此学僧自然会认为自己当地的传统风格与佛学院的诵经风格存在一定／较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入学前学僧们基本都没有学习过傣语经文诵经，因此这种风格的差异并未给他们的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四、学僧对诵经风格的学习和实用情况的判断

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是明确学僧对地方诵经风格和音调的了解和掌握情况，这部分需要学僧结合学习经验进行判断。

学僧认为，毕业后如果回到原来所在的村寨佛寺，信众能够接受自己在佛学院所学的巴利诵经风格和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的比例高达92.8%。同时，有67.6%的学僧选择回到村寨后会使用佛学院学到的诵经内容和风格，23.6%的学生选择改用地方风格，1.4%的学生备注说回去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再决定，还有7.4%的学生表示不知道怎样选择。

对于自己所在地区的巴利语经书诵经风格，有79.1%的学生表示是了解的，而对于所在地区的傣语经书诵经风格，比例相对更高，为88%。在此基础上，学僧们经过在佛学院的学习后，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使用地方传统音调念诵巴利经书的比例占29.9%，会一些的占53.7%，不会的占10.4%。而经过学习后仍会用地方传统音调念诵傣语经书的比例占26.9%，会一些的占58.2%，不会的占9%。针对这两个问题，有6%的学生认为自己不能做出判断。

目前，佛学院傣语故事经诵经音调的课程，安排在供养经书仪式举行前集中进行。据笔者对20世纪90年代在佛学院任教的老师和毕业生的访谈来看，彼时傣语故事经的诵经音调在教学中很受重视。这一被称为“朗木坦木”（诵经音调）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辅助傣文教学，这点与传统村寨佛寺教育相似，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傣文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结合这一情况，笔者在调查问卷中提出了“是

否希望通过学习傣语诵经音调来更好的掌握傣文？”和“是否希望能跟地方的老人学习传统的诵经音调？”两个问题，结果显示，学僧均做出肯定的选择。

由此可见，目前西双版纳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诵经风格分区，但大多数佛学院的学僧，会选择使用在佛学院学到的巴利经文诵经内容和风格，而关于傣语故事经，学僧则普遍想要学习各自地方的传统风格。这一调查结果与目前巴利经文诵经地方性风格逐渐弱化，而傣语经文的地方诵经风格仍然能够辨明的现状相符。同时学僧们不仅在学习诵经时并没有很大困难，也表示在学习后仍能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地方传统诵经风格。学僧灵活可变和兼而有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诵经风格的多元、融合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五、学僧对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看法和未来规划

问卷的最后一部分，尝试了解学僧对佛学院经文—诵经及其他课程设置方面的看法，对所学内容的运用，其他方面的学习需求和意见，以及毕业后的发展规划。从更深层次了解学僧群体的想法，并反映出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和方式的实际效果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在西双版纳各地恢复重构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传承的趋势。

（一）调查情况

首先，从学僧的入学动机来看，多是在家长和大佛爷的安排下来到佛学院读书，自愿前来学习的人数仅为4%。

其次，从学僧对具体教学内容的评价和需求来看，他们普遍认为应当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也都认同有关傣文和诵经内容的学习会对以后有很大帮助，有96.7%的学僧认为自己以后会将现在学习的诵经内容和风格应用于地方佛寺的教学中。而针对学僧对目前佛学院教学和课程安排的看法，问卷采用半开放的答题形式。学僧主要表现出三类态度，一部分学僧对佛学院的教学安排没有过多的想法，认为现在这样就可以；另一部分学僧则认为，现代教育课程和传统佛寺教育课程在早、中、晚都有安排的方式，让他们感到非常辛苦，其中有学僧认为，多种学习内容的穿插令他们感到“很混乱”。此外，还有一些学僧对佛学院的教学安排和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认为教学管理和上课的进度很松懈，提出“（教学）不够严谨，应该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

第三，从学僧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来看，中专班学生希望毕业以后能继续深造的比例为38.9%，有学生写出具体的地点，如泰国、斯里兰卡等；毕业希望回地方做寺院住持的有11%，此外还有33%的学僧想毕业后还俗，剩余学生表示暂没有想法或不知道。而初中生对自己读完初中后的规划则相对简单，53.3%的学僧表示想继续深造，其中一部分希望读高中/中专，另一部分则希望去东南亚学习；其他46.7%的学僧表示毕业后想要还俗，可以的话就继续读书，不行就工作。

（二）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这一调查结果，结合笔者与佛学院招生老师的访谈，佛学院的学僧中有一部分是在地方佛寺和学校里很“不好管”的学生，因此才被家长送到佛学院。而佛学院通过明确的分工，能够在生活和学习上对学僧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和教导督促，对这些学生形成了有效的管理。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学僧在入学后，在学习态度和认知方面，普遍对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方面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并且也在学习上有了自己的想法、选择，会提出更多的学习需求。由此可见，佛学院的集体教学管理不仅有助于学僧学习具体的宗教文化知识，还能够从整体环境上督促和影响学僧，有助于他们系统

地了解南传佛教文化，确实有利地缓解了现代学校教育与佛寺教育之间的矛盾。

结合调查结果来看佛学院经文—诵经系统的传承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大部分学僧认为，将来会把在学校学习到的内容和风格应用到地方佛寺的教学中，这里先不考虑未来可能的变量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出诵经风格系统未来发展会有多元融合的趋势。尤其在巴利诵经风格方面，佛学院风格会对地方风格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从佛学院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确立来看，形成了与以往传统村寨佛寺教学传承体系的平行发展，而佛学院集体、规范的学习管理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依托地方村寨佛寺传承的地方诵经风格分区。随着西双版纳各地很多熟悉传统的老人逐渐过世，加上现代学校教育的推动、汉化程度的增强，南传佛教传统的地方经文诵经风格和经腔系统传承，实际上已经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这时，依托总佛寺确立并日益发展成熟的佛学院教学模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村寨佛寺没有能力组织传统佛寺教学的境况，有助于僧才的培养，并逐渐形成完善的僧才培养体系，同时为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其次，佛学院的教学系统已经对地方佛寺产生影响，例如佛学院的巴利诵经课本在地方寺院的推广使用，诵经风格的影响也在各地有显著的体现。

第三，傣语故事经的诵经风格则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地方风格分区。一方面，佛学院教师的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建立在他们原本掌握的地方风格的基础之上，佛学院会安排与学僧所属生源地或诵经风格相近的授课教师进行分班授课；另一方面佛学院傣语故事经的诵经属于非常规教学内容，因此学僧在这方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仍需依托地方传统风格的传承。此外，通过在佛学院的学习，大部分学僧意识到传统诵经内容及风格的丰富性对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回到西双版纳各地时，也会有意识地向老人了解和学习各种传统的诵经音调和地方佛曲，产生了自发学习保护传统诵经风格的趋势。

整体来看，目前西双版纳佛学院巴利经文的诵经内容与风格系统，对西双版纳各地的传统传承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多元融合发展的趋势，但各地方诵经风格系统仍然会在一定阶段内继续维持，同时还会受到诸如跨界传播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傣语故事经诵经风格方面，佛学院的教学在整体上仍维持了西双版纳傣语故事经的传统诵经风格的分区。

六、问卷调查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

笔者针对南传佛教佛学院的教育模式中经文—诵经教学系统的构成及其发展情况，以佛学院的学僧作为调查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收集基本材料，对一系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得出有效的调查结果。问卷调查方法强调实证，而实证主义方法论所强调的是对研究的假设进行实证和整体主义的研究，需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因此，结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需求和笔者一定的调查经验，认为可以从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切入点和目的，调查问卷方法在具体使用中的注意事项这两方面提出初步的建议。

（一）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切入点和目的

1. 在民族音乐学的调查中，对音乐文化持有者进行调查以及对音乐文化内容进行收集具有集中性，因此调查问卷作为标准化的数据收集程序，可以用于了解研究对象和当地音乐文化的基本情况。不仅有助于快速融入调查群体以及同研究对象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能够为针对焦点问题的集约调查提供有效经验。

2. 调查者经过前期调查，对研究对象和区

域有整体性的把握，并确认能够在一定社会场景、群体中持续地识别出相关的调查对象、问题和现象的基础上，产生运用调查问卷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基础或深度调查的需要。随后通过逻辑规范、细致准确的问卷调查组织，一方面，对问卷答案进行详尽有效的统计、分析和总结，能够使研究在微观上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可以参考分析结果，进一步用于访谈、参与等调查方式当中，增进整体调查效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注意事项

1. 把握基本原则：问卷调查在社会科学的调研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使用方法和规范。民族音乐学在对其进行借鉴和使用的过程中，先要明确问卷调查是针对某一问题，在一定的规范中用问题的形式收集材料，并将这些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这种标准化、统一化的收集程序在针对人文研究对象的调查中并非普遍适用，因此需要在准确把握问卷调查功能和方法的基本使用原则的基础上，针对适当的对象和问题进行使用，避免做无用功。

2. 确认可操作化范围：综合考虑研究对象及调查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确定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方法的可操作化的范围。（1）研究范围和对象具有进行量化调查的可转化性，研究者要判断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结构，制定问题时要定位层次和目的，达成从音乐对象层到研究知识层的信息转化的可能。而这种转化要基于局内人的主位观，即考虑到参与者能够借助问卷表达自己的信息和观点，如此才能使问卷具有系统和意义。（2）参与者群体所处的地域／区域、调查的音乐文化事项／问题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民族音乐学调查群体多分布在村寨当中，考虑到这一现实因素，且以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主观上的不稳定性，要展开问卷调查，首先要考虑该方法在田野调查中展开的阶段及目的，再据此设计田野调查与分析研究的衔接方式。此外，问卷的参与者及调查事项在一定的调查范围内需要具有稳定性，这是保障调查样本数量和质量的基础。因此，对于民族音乐学的调查而言，如果是田野调查前期为了便于进入田野，作为了解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手段，那么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调查问卷方法具有较广的适用范围；但如果是有深入调查收集资料或有针对性地解答相关问题的需要，那么问卷调查方法则更适用于聚居在城镇当中的调查群体，尤其是具有稳定性的办公场所和学校当中。

3. 整合调查渠道：由于音乐行为依托于人而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特殊的构成方式，故此，要结合本学科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做到问卷调查方法的“民族音乐学化”。一方面，要考虑问卷调查方法的调查渠道，除了相关政府单位和相应权威机构的支持，还要充分运用研究对象的相关社会关系，或者由研究者直接进行发放和收集等。另一方面，要与民族音乐学聚合性（聚焦式）、离散性（融入参与式）[⑬]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在结合的方式上，可以考虑综合问卷与访谈（采录）、问卷与参与观察等方式。

4. 考虑文化整体性：问卷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媒介，那么问卷设计的信度和效度就成为关键。由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及其研究人员普遍不强调／不擅长统计测算，因此要尽可能对社会科学问卷调查方法进行灵活的转译和改良，要充分考虑文化背景因素，以及调查内容的整体性，控制调查质量。民族音乐学调查多涉及使用不同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群体，因此尤其要充分考虑到参与者语言文字系统的多样性，特别是母语非汉语参与者的汉语水平。并据此确定问卷使用的语言／文字，设计表达上谨慎、文化上得体的问题，要重视问卷中概念的一致性和表达的统一性，尽量用调查对象

⑬同注⑦。

的文化习惯进行表达，以此保证研究者和调查对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问卷中的概念和表述达成相同的理解。

5. 以人为本：理想的问卷在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到两个功能，也就是问卷能将调查者的问题顺利地传达给被访者，而被访者能够顺利回答问题并为调查者所用。进而，在民族音乐学对问卷调查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尤其要考虑到音乐这一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给予调查对象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考虑到“人”的感受。要结合考虑被调查群体对问卷形式的接纳程度，在其能够接纳的前提下注重安排好问卷调查中的各种细节，包括保密性、问题设计、组织方式等，令被访者可以接受问题并回答，同时回收问卷后调查者能够处理问卷材料并对收集的数据材料进行分析，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性。

6. 注意过程控制：对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是保证问卷调查实证性的基本手段。“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范畴内的科学主义流派,来源于对于自然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在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的模仿，并以此实现其科学性。”⑭问卷调查从研究者到对象，是建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一特征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更为突出。那么涉及到相关分析，就需要考虑将“主观建构”的方式纳入客观控制变量的方法中，形成问卷文化背景、具体内容、问题结构的贯通性和整体性。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要结合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性，充分考虑调查范围和所涉人员的情况“专事专办”，最好调查者在被调查群体中有较高的被接纳度和融入度，另外开展时能尽量依托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和方式。如条件允许，能够有统计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协助，可在设计问卷时考虑到涉及测算的选项，也可以通过抽样、统计尝试寄送问卷调查和网上问卷调查。如未有充分的开展条件或专业人员的协调帮助，不建议盲目涉及，以免有损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立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方法，需要结合本学科研究实际，从知识论系统、研究视角和问卷设计上，形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沟通和整合。民族音乐学的“扬长避短”，并非是对与人文对象相关性小的诸如调查问卷方法的规避，而是根据本学科研究实践的需求，结合跨学科方法论进行恰当的借鉴和转译，从而“取长补短”。本文尝试基于整体概念语境结合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建构针对具体问题的问卷，并得出较系统的分析结果。虽然仍有不足，但确实在民族音乐学对调查问卷方法的运用上，前进了一小步。希望借此开启对民族音乐学领域对问卷调查方法运用的尝试，促进该方法在学科研究实践中的拓展，以推动使用规范和方法的完善。

责任编辑：樊　荣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仪式表演语境下中—缅—泰南传佛教诵经音乐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8CD177）的阶段成果。

⑭黄盈盈、潘绥铭：《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构建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第174页。